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桐城派

王 镇 远

6.5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这套丛书是向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知识，内容包括文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以及文学体裁方面的基本知识。丛书的编写力求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叙述简明扼要，文字通俗易懂。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桐 城 派

王 镇 远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375 插页 2 字数 85,000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5325-0235-X

I·109 定价：2.50 元

引 言

假如你坐船沿长江顺流而下，过了九江，江面就更加浩淼漫衍，两岸的山势也渐渐不再陡峭，安庆以下，便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虽然没有瑰奇幽邃的壮观，却给人一种平衍质朴的美感。桐城就在安庆的北面，在清代，它的辖境较现在的县境为广，枞阳镇^①已处在濒江倚原的地方。而桐城的西面便是绵延数千里的大别山，著名的桐城西山、龙眠山、投子山、嵯峨山就在县城的西北面，秀丽幽深的景色令人留连忘返，所以姚鼐说：“夫黄、舒之间^②，天下奇山水也。”虽然山水对生活于其地的人们心灵与气质上的影响是极其微妙的，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这种影响的存在，古人所谓人是山川灵气所钟，自然与人心的感知和交流无时不在发生，清初的宰相桐城人张英就说：“桐城山秀异，而平湖濠洄曲折，生斯地者，类多光明磊落

^①现已为枞(zōng宗)阳县。
即在黄山、舒城之间。

^②黄、舒：黄山、舒城。桐城

之士，余入仕版^①，每于岩廊^②，见海南耆宿，必曰而桐士也。端重严格，不近纷华，不迳势利，虽历显仕，登津要，常歆然^③若韦素^④者，此桐城诸先正家学也。新进之士于众中觐其气度，多不问而知其为桐人，予志斯语久矣。”（《笃素堂文集·龙眼古文初集序》）姚鼐也曾感叹桐城一带人文之盛：“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都说明了自然对人的影响。以此来解释为什么桐城一县在短短的二百多年时间内产生出那么多文人学士，也许太空幻与神秘，然而桐城派作为南方文学的一种典型，前人已屡有述及，如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清代中叶，北方之士，咸朴儻蹇冗，质略无文；南方文人，则区骈散为二体，治散文者，工于离合激射之法，以神韵为主，则便于空疏，以子居、皋闻为差胜。”自注云：“此所谓桐城派也，馀咸薄弱。”至如王葆心则以为与其称为桐城派，不如称之为“南派”：“自程鱼门、周书昌发为天下文章在桐城之言，世人类以桐城派称南方之文，然隘以桐城之称，不如竟称以南派为得其实。盖自宋迄明，南方文家已定立宗如此，虽今世之文，启之者为桐城人，然不能出宋时南派

①仕版：官吏的名簿。入仕版即指入仕途。 ②岩廊：高峻之廊，后世为朝廷的代称。 ③歆(kǎn 砍)：谦虚的样子。
④韦素：柔弱朴素。

欧、曾之范，桐城诸家特承流而衍之耳。”（《古文辞通义·总术》）依此说，桐城派只是自宋以来南方散文传统发展的结果。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姚鼐固然都隶籍桐城，然姚鼐门徒中有江苏、江西、福建、广西、湖南等地人，而北方学者则很少受其沾溉。这种现象可以为当前日益兴盛的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课题和一些新的材料。

然而奇异的是我们读桐城派文章所得到的感受与本文开头时所描写的自然给我们的感受不无相似之处。桐城派的文章以明白清通、流美畅达见长，给予人的也是一种平衍质朴的美感。虽然桐城派作家各有自己的风格特征，但其基本的审美理想还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将桐城派的文章与清代初期的钱谦益、侯方域，中期的袁枚、汪中以及后期的袁枚、魏源等人的文章加以比较的话，其中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桐城派以一种凝炼而又明畅的文风卓立于清代文坛，胡适曾经说：桐城派把文章做通了。还是颇能切中肯綮的批评。探讨和研究桐城派发展的轨迹，对于了解清代散文发展的过程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对总结和借鉴我国散文创作与散文理论的遗产也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又是一个学术昌盛的时代。各种思想、各

种学派在清代都找到了它的继承者。因而清人一般以治学为第一要务，清代文人要立足于士林，首先是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桐城派文人以他们鲜明的文学主张与创作风格形成一个文学流派，但桐城派文人的学术思想也表现出基本一致的特点，这就是他们恪守程、朱理学的立场。他们在清初不满阳明之学，与颜、李学派立异，迎合了统治者提倡理学的意图；在乾嘉时期，他们又不受世风所染，笃守宋学，与以考据为特点的汉学派对峙；在道咸年间，则于程、朱理学中融入经世致用的思想，与洋务派、改良派有某些共通之处；在清末，他们又以程、朱理学为武器对抗新思想、新文化。因而有的论者以为桐城派不尽是一个文派，而且是一个学派，因而对桐城派的研究，在考察清代的思想史、学术史方面也是不无帮助的。

桐城派历时二百余年，几与清朝的统治相始终。前期桐城派文人的经历体现了清初统治者对文人恩威并施的政策，而在清代中期以后，桐城派文人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其中有像曾国藩这样的辅弼大臣，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也有像薛福成、吴汝纶这样的洋务派重要成员；还有像严复、林纾这样对传播西方思想起过重要作用的翻译家。总之，桐城派文人在一部清代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作为一种历史的陈迹，桐城派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但作为一种对历史的认识，桐城派则显然还有它一定的研究价值。因此，我们这本小书一方面力求客观的介绍，以期读者对桐城派的发展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另一方面，又不无笔者个人对桐城派的认识和阐释，文中不少地方还吸取了当代学者的某些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目 次

引 言	1
一、桐城派的先驱者——戴名世	1
(一) 生平与思想	2
(二) 文学批评理论	7
(三) 散文创作	12
二、桐城派的开创者——方苞	19
(一) 生平与思想	19
(二) 以“义法”为核心的文学理论	27
(三) 散文创作	35
三、桐城派的拓大者——刘大櫟	43
(一) 生平与哲学思想	44
(二) 《论文偶记》	50
(三) 散文创作	54
四、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	61
(一) 生平与学术	62
(二) 散文理论	66
(三) 散文创作	71
(四) 《古文辞类纂》	77
五、桐城派的传播者——姚门弟子	82

(一) 时代风尚与共同祈向·····	82
(二) 姚门四大弟子·····	87
(三) 桐城派的传播·····	102
六、桐城派的改造与复盛——曾国藩及	
曾门弟子·····	114
(一) 曾国藩·····	115
(二) 曾门弟子·····	122
七、桐城派的式微——清末民初的	
桐城派文人·····	131
(一) 严复、林纾·····	131
(二) 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	139
八、余论·····	147
(一) 对桐城派的批评·····	147
(二) 桐城派与阳湖派·····	154
(三) 桐城派之诗学·····	157

一、桐城派的先驱者 ——戴名世

由地域而言，桐城一地明清间已人才辈出。以节义闻名者如左光斗，以学问名世者如方以智，以诗人著称者如方文、钱澄之，以官爵荣显者如张英。据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载，在明代与清初桐城值得一书的人物就不下百余位之众。广义地说，这些桐城前辈都是桐城派文人的先驱者，但他们毕竟与方苞、刘大櫆、姚鼐的出现很少直接的联系。

由文统而言，桐城派标榜由明代的归有光接绪唐宋八大家，再上追《史记》、《汉书》，最终溯源到儒家的经典，如《左传》、《三礼》等。因而有的论者在介绍桐城派的历史时将自司马迁起至归有光止的古代散文家都纳入桐城派的家谱，这种做法难免有攀附高门之嫌，也为笔者所不敢取法。

下文我们要述及的是与桐城派初祖方苞关系极为密切的戴名世。戴氏以文章气节与有志修史而闻名于当时，后因遭《南山集》案而受杀戮，一般桐城派文人对此讳莫如深，这自然出于政治上的

圭臬和忌讳。其实戴氏的文学理论与散文创作对后来桐城派的影响颇深，实有“革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功劳，可谓桐城派的先驱者。

（一）生平与思想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因晚年曾一度隐居于故乡桐城的南山，故世称南山先生。

戴名世出生在一个诗书之家，曾祖父孟庵先生为明诸生，颇有声望，明亡时痛哭流涕，剃了头出家去龙眠山作和尚。祖父曾在江西作官，祖母就是河南左布政使吴一介的孙女。父亲名硕，字孔万，号霜岩，康熙十一年(1672)补县学生，以授经为业。平生喜作诗，推尊杜甫，在他身后戴名世检其遗物，得诗百余卷。戴名世六岁时起从塾师读书，五年内即将《四书》、《五经》读完，遂研习经书，尤喜浏览各朝史籍。他为人豪爽，好结交朋友，十八岁时即常与同里一班杰出的青年聚会畅饮，纵论文章之事。二十岁时始授徒，遂学时文^①，并与左光斗之孙左未生切磋，他以为左光斗“生平好为清真切实之文，深入骨理，尽落皮毛，而刚劲之气不可遏抑。”(《左尚子制义序》)戴氏的时文能

①时文：旧时称科举考试采用的文体，即八股文。

融汇经史，故深受当时人所推重，有人以他与以时文著名而享高位的韩菼相比。到了二十七岁，他才受知于督学使者刘本斋，第二年补了县学生，以后便在舒城一带以教书为生。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他三十四岁时始入京师，以贡生就读于太学，得交刘齐、徐念祖、方苞等人，他们常常聚会，放言高论，纵谈天下之事，一时在太学诸生中被称为“狂士”，并被认为是“清议所从出”（见方苞《四君子传》）。次年，戴名世应京兆试，未被取中，以后客居京师、金陵等地，又漫游四方，足迹远涉冀豫、齐鲁、吴会、越闽等地，以卖文授徒为业。至四十九岁才买宅桐城南山，有归隐之志。门人尤云鶚刻其文一百十余篇，题名为《南山集》，据说那只收录了他五分之一的作品。五十岁那年便归居南山砚庄，然时常出游，客金陵、姑苏等地。他五十三岁时才中了举人，五十七岁又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两年之后，便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南山集》案。事情是这样的：

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上疏参奏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所谓“狂悖”云云，后来据全祖望《江浙两大狱记》^①中说是因为《南山集》中引用

^①见《鮚埼亭集·外编》卷二二。

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而《滇黔纪闻》中使用了南明永历的年号和纪录了南明的史实，所以为清廷所不容。但赵申乔所以要指摘戴氏，实出于个人恩怨，因为戴名世会试第一，而殿试却得了第二，第一名状元被申乔之子赵熊诏得去，然而赵熊诏的文名远在名世之下，故时人颇疑赵氏舞弊，赵申乔也惟恐败露，故欲置名世于死地而后快，其上书中说：“臣与名世素无嫌怨”，却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自我招供。然而这种个人的私怨，正适合了清廷为了钳制思想、威慑人心而大开杀戒的需要，遂将名世逮捕入狱。在刑部狱中戴氏修订了穷毕生精力而作的《四书朱子大全》一书，于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六被杀，成为清政府对知识分子高压政策的牺牲品，其书版遭毁禁。受此案牵连者也分别受到流放或编入旗籍的处罚。

戴名世的惨遭杀身之祸自然是一场历史的悲剧，然而也由于他个人思想、个性上的因素使然。他为人狂狷，性情放达。其《与何杞贻书》中说：“仆好交游，孳孳求之，惟恐不及，然其于当世之故，不无感慨忿懣，而其辞有稍稍过当者。世且以为仆为骂人，仆岂真好骂人哉？而世遂争骂仆以为快。”可见他与世情乖违的处世态度。尤其是对当权者，他决不卑躬屈膝，其《北行日记序》中说：“宰辅大官，相见一揖外无他语。酒酣论事，咄嗟

呼嘻，旁若无人，人颇怪之。”一个不苟钻营、青天白眼、使酒骂座、桀骜不驯的狂士形象于此可见。因而他的得罪当权者也就是意料中事了。他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曾说道：“有金陵门人欲镌仆古文于板。仆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与刘大山书》）可以说是他心中隐忧的真实表露。这种愤世嫉俗的个性、不合时宜的文章，在文网高张的年代自然是很难逃脱杀身灭族之灾的。

戴名世的思想基本上以儒家道义为指归，但也并不与一般世俗之儒相同，他喜与释徒交往，他自己说：“余不为浮屠氏学，而尝好与浮屠氏游。余儒者，与当世所谓儒者异，以故当世儒者皆畏恶之，独一二浮屠氏不忍余弃也，贤余才，从之游。夫儒者弃之，而见收于浮屠氏。”（《送释钟山序》）他对《老子》一书也以为：“不见其有谬戾圣人者。”（《老子论》）但他的论学还是一依程、朱理学。戴氏皈依程、朱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这与当时康熙皇帝极力提倡程、朱之学的风气有关；一方面戴氏有鉴于明人学术的紊乱和明末世风颓败，故有意力矫时弊。于是他晚年致力于《四书朱子大全》一书的编辑工作，至死方休，他以为：“二程始发孔、孟之秘于千载废坠之余，至朱子出而其学尤为纯粹以精。”（《四书朱子大全序》）

戴氏在史学上的志趣甚高，以修撰《明史》为平生宏愿，为此他收集了大量材料，但始终未能付诸实行，现存于其文集中的传记有五十余篇，《子遗录》及南明党祸及扬州、榆林、保定等城守纪略展示了他对史料的熟稔和驾驭史传文字的能力。对明季史料的关心自然反映了他对故明的留恋和怀念，这与他的家世与社会地位都不无关系。由于戴名世在思想和学术上所表现的多相性、复杂性，致使对其思想倾向与历史地位的评价在学术界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贬之者以为：“戴氏之学术思想，在哲学方面实平平无足道”，“戴名世生于清初，不同于明末遗老，亦无排斥满族之思想，其中心所崇仰者，不过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①尊之者则以为：“戴氏不独有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即以激进深刻的政治思想与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而论，在桐城文人中，亦不过一人而已。”^②或以为：“戴名世出于民族大义，由悼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大胆揭露了清王朝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白骨堆上建立统治地位的血腥罪行。”^③然而平心而论，戴氏的思想倾向与他的出处行藏都表现出他始终处于矛盾的心态之中，表现了一个封

①王树民《戴名世集·前言》。 ②许总《论戴名世及其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江淮论坛》1984.2）。 ③漆绪邦、王凯符《桐城派文选·前言》。

建社会后期下层知识分子依违不定的情绪。他于三十五岁乡试落榜之后，似乎绝意仕进，甚至买宅南山，打算去过隐士生活，但他毕竟不甘寂寞，居家不久，又出游金陵，终于在五十三岁再度出应乡试，五十七岁出应会试，博得两榜出身，可见他对清廷未尝抱有坚决不合作的态度，然而由于他长期生活在社会的下层，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牢骚往往溢于言表，加之其性情的狂狷，故最终构成了他一生的悲剧结束。他对明代遗民的推崇和向往，一方面表现出他对前朝的怀恋，另一方面则基于他对程、朱忠孝道德观念与名节观念的宗仰，以及留心明季史料，欲成一代之史的企望。因而，很难根据戴氏屈死于清廷的屠刀之下，便给他戴上民族英雄、爱国志士的桂冠。

（二）文学批评理论

戴名世虽曾致力于经史，但他主要的成就还在于文学，尤其是他对桐城派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致使后人甚至认为他是桐城派的“开山之祖”^①。这种影响表现在他与桐城派的开派人方苞的关系之中。戴氏与方苞虽系同乡，但方氏居金陵，故至戴氏三十四岁初入京师后才得订交。在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方灵皋稿序》中他历叙了自己与方苞的交谊，尤其强调了他们切磋文章的情形：

盖灵皋^①自与余往复讨论，而相质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辄举以示余，余为之点定评论，其稍有不惬于余心，灵皋即自毁其稿。而灵皋尤爱慕余文，时时循环讽诵，尝举余之所谓妙远不测者，仿佛想象其意境，而灵皋之孤行侧出者，固自成为灵皋一家之文。

方苞的《南山集序》中也说：“余自有知识，所见闻当世之士，学成而并于古人者，无有也；其才之可拔以进于古者，仅得数人，而莫先于褐夫。”可见戴、方二人互相引为知己，并时常以论文为谈资，这种切磋对方苞的影响是明显的，尤其是在他们文学批评的理论中可以见到。

戴氏论文推尊唐宋八大家，他说：“唐宋八家之文，皆学者所当诵习。”又说：“余少好古，而尤嗜八家之文。”（《唐宋八大家文选序》）故他深契于明代唐宋派古文家的代表归有光，自云：“余从事于古文有年矣，虽不能为古人之文，而窃知之不同于众人。最后得归震川之书，有惬于心，余好之。”（《书归震川文集后》）他以为归有光的散文能得司马迁《史记》之真传，即所谓“得其神于百世之下”，这种对归文的推重又是与不满明代七子的摹拟之

①灵皋：方苞字。